

# 明清易代之际的降将书写

吴海峰

西北大学历史学院，陕西省西安市，710127；

**摘要：**明清易代之际，战争频仍，局势纷乱，降将作为特殊的群体，游走在农民军、后金（清）军和明皇室三种势力之间，地位显得暧昧而不可忽视。对于游走在各方势力之间，时降时忠，飘忽不定的降将来说，各方势力如何评价降将的所作所为，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历史书写问题。不同立场下的文本建构，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降将形象。从明遗民到清初官方的不同评价，再到乾隆朝开始的贬低降将和晚清以降民族主义发扬下的降将形象之再构，明清易代之际的降将书写呈现出多元化的面相。从文本的多元面相出发，深入理解其背后的政治意蕴，将是深入理解降将问题的重要切入点。

**关键词：**明清易代；降将；历史书写

**DOI：**10.64216/3080-1486.25.05.042

在中国历代王朝更迭之际，臣子往往面临效忠故主抑或归附新君的政治抉择，以二十四史（若计入《清史稿》则为二十五史）为代表的正史对此多有关注，并设置专章给予记载，专门讨论忠贰问题。明清鼎革之际，农民军、明朝和南明小朝廷以及后金（清）军多方势力角逐天下，战争频仍，复杂的局势给了降将更多的表现舞台，也让后世对于明清易代之际降将的书写呈现出多元化的面相。

## 1 明清易代之际降将史实概要

明清易代之际，战事不断，保卫大明王朝的武将群体们，面临着为了捍卫大明王朝尽忠还是为了保全身家性命投降新朝的问题。尽管后世的各类历史文本，或基于表彰忠义之目的，或本于发扬民族精神之动机，大力表彰易代之际武将们的忠义之举，然而实际上真正持有此种忠义之心并且愿意为之牺牲的却只占少数。考诸文献，早在入关之前，后金政权已十分重视利用归降汉人来扩展其军事势力，而明朝降将的倒戈，也是满洲人得以征服辽东的主要原因。<sup>[1] (P47)</sup>自满洲人出兵犯明，经入关、南下、定三藩，乃至平中国台湾，明降将几乎无役不与，对清朝的开国，实有重要的影响。<sup>[2] (P6)</sup>

选择背叛明朝的降将，从方式上看，有主动与被动之分。主动型降将，主要是对于明朝政局腐败，朝局动乱，百姓生活苦不堪言之情况而感到失望，以至于对明王朝失去基本的归属感，走向了明王朝的对立面，在政治混乱的情况下，导致人心的疏离，升斗小民谨求自保，文臣武将惘顾效忠，辽东边将降清的事例，遂层出不穷；

<sup>[2] (P66)</sup>被动型降将往往或因为在两军对峙时，战败被俘而不得不投降，如洪承畴，或因为政治斗争失败而不得不投降后金（清）集团，如毛文龙被杀之后的东江武将集团。从降将的投降对象来看，有选择投降明末农民军势力的，也有选择投降后金（清）军的，而主要以后者为主。

选择背叛明朝的降将们，无论其有着多么不得已而为之的苦衷，也无论其在事后存有哪怕再多的愧疚感，终究违背了传统儒家道德思想中的忠君思想与忠义观，因而备受后世争议。明遗民基于对故国灭亡之悔恨，将降将们视为明朝灭亡之一大原因；清朝早期，出于笼络人心和利用降将平定天下考虑，往往表彰降将，给予其以隆高地位，“清人入关之前，已订定招揽汉人以为己用的政策，并对降附的汉人甚为礼遇。顺治朝与康熙朝初期，对立有功绩的降将，在其生前皆不吝封赏，死后且追赠谥号……”<sup>[2] (P287)</sup>清廷对归降者的优待，到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后，发生了重大的改变<sup>[2] (P289)</sup>。以《贰臣传》的问世为标志，乾隆帝最终认为，降清武将尽管对国朝隆兴有一定的贡献，但他们不忠于前朝，在忠君的原则下“大节有污”，这却是不争的事实。他们背离“忠君大义”的行径，理应受到后世的批评和指责。<sup>[1] (P221)</sup>这种官方的盖棺论定，基本上构成了后世对于降清武将的基本认识。只是到了晚清以降，对于降将们的批评与指责，从清朝官方立场下的“为后世植纲常”一变而为排满革命，反对降将们投降少数民族政权，破坏了传统的夷夏秩序。明清之际的降将研究，在清末民初，

作为晚明记忆的一部分，已经成为清末民初“言必称明末”的顽强的浓烈的背景。<sup>[3] (P8)</sup>

## 2 批评与表彰：明遗民与清初官方的降将书写

降清武将，是清朝灭亡明朝势力的主要力量，也是镇压各地抗清势力的重要凭借，因此在明清易代之际，对立的双方如何评价降清武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也是历史叙述话语权争夺的表现之一。明遗民与清初官方，采取了截然不同的评价模式。所谓明遗民，是指“自明朝崇祯皇帝朱由检自缢煤山至清朝康熙皇帝爱新觉罗·玄烨统一中国台湾时期内，忠于明室的有文化修养的缙绅士大夫”<sup>[4] (P3)</sup>；他们基于亡国的悲愤，反思明亡之原因，视降将倒戈为明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大加鞭挞降将的卑躬屈膝，背典忘祖。而清初官方，为了笼络人心，团结力量以更好地平定天下，往往给予降将以礼遇，正面表彰降将入清之后的所作所为。

在崇尚气节的明朝社会，失节行为，无论出于何种原因，都是个人操守上的污点。在传统中国社会，士君子读书学问，“所务者忠与孝而已。”明遗民对于降将的批评，主要基于两点。一是降将背叛故国，且追随清军势力，一路入关、南下，成为灭亡明朝的主要力量之一；一是指责其失节辱身，违背了传统的儒家道德伦理和忠君思想。明遗民身处新旧交替之际，面临忠义、生死之间的两难抉择，他们没有选择为明朝殉节，也没有和贰臣们一般投降新朝。此种两难之境地，表现在遗民内心深处的则是对忠义的表彰和贰臣的痛恨，以及对自身行径的惭愧。因而明遗民对于投降清朝、且在灭亡明朝和镇压抗清武装中发挥作用的降将们，多有批评。遗民通过记录历史，来表达对故国的思念。“遗民作为‘故国’所‘遗’，因‘国’之故而成‘故’；遗民又以‘存史’（包括遗民史）为‘存明’”。<sup>[5] (P337)</sup>明遗民借助文集、诗歌、写史、碑文等多种方式来表达对降将的批评和对忠义的表彰，给后世留下了丰富的史料。考诸此类文献，是研究遗民降将观和遗民心态史以及精神风貌的重要材料，值得我们重视，如赵园就指出要注意遗民学人为学的条件、他们从事学术的环境、心境，解释他们的某些取向、方向。<sup>[5] (P339)</sup>

与明遗民主要注意降将们的道德层面不同，清初官方往往从现实政治出发，给予投降的汉人降将们以礼遇，认可他们的功绩。清初舆论在议事论人的时候，事功和社会实效等考虑，往往要较道德空言来得更为重要。<sup>[1]</sup>

<sup>(P57)</sup>这一情况与清初面临的严峻现实状况实在分不开，清初虽然已经入关，在北京定都，但是各地反抗的力量还很强大，加之南明朝廷依然存在。清朝统治者离不开降将的支持，也需要降将们在平定天下的过程中发挥作用。因此清初诸帝对襄赞开国有功的降将，并未刻意持轻视与贬斥的态度，换言之，其投降行为或可议，但其功绩实不容抹煞<sup>[2] (P288)</sup>。清初对于降将们的表彰只是一种基于现实出发的权宜之计，并不代表了清朝官方就认同违背传统伦理的贰臣之举。以洪承畴为例，其生前虽位极人臣，但是身后在历史中的评价，却随时代而变化，最终在乾隆一朝被列入《贰臣传》。<sup>[6] (P392-412)</sup>降清明将，虽道德有亏，然终究对清朝平定天下功莫大焉，道德与事功的矛盾使得其在官方的评价体系中处于暧昧而复杂的境地。

## 3 失节有亏与民族叛徒：从乾隆帝修《贰臣传》到晚清民族主义者笔下的降将形象

清朝在稳定政局之后，开始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重塑道德伦理，重建三纲五常。在重塑传统道德伦理的过程中，如何处理明清易代之际的明末殉节之士和降清的贰臣，是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在这两个问题上，清朝采取了两大举措。一是表彰明末殉节之士，对明清易代殉节明臣进行表彰，并把他们的事迹编成史册，题为《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该书的编撰，乃官方正式向外宣布，为南明抗清运动的死难者平反，并肯定他们为国忘家、杀身成仁的道德操守；清官方把控历史书写权，并对私家记载明末史事进行干涉，修《诸臣录》也不过只是清朝巩固统治、重塑道德纲常的手段而已，与明遗民的表彰殉节之士目的、动机截然不同，需要别而观之。与此相对应，站立在明末殉节之士对立面的贰臣、降将们，如何评价、如何处理，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乾隆帝采取的是总体否定贰臣、降将的态度，将其列入《贰臣传》、《逆臣传》，认为尽管这些降清者对清朝开国隆兴有一定的贡献，但他们不忠于前朝，在忠君的原则上“大节有亏”。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贰臣传》及《逆臣传》两书所反映的，不止是清代官方对降清明臣在评价上的转变，同时也是乾隆皇帝本人对当时政治社会新形势的认识——在满洲人入关超过一个世纪后，过往明朝变节者的合作，已不再具有任何稳定政权的实际作用，而今后清室要继续巩固其统治地位，则必须依赖辖下所有臣民对

她的绝对忠诚。<sup>[1] (P257)</sup>降将背叛了自己的故国，被清朝所利用，终究也得不到足够的谅解与同情。作为易代之际特殊群体的降将，就这样被清朝官方在历史书写中所贬斥，再也无法回到此前的隆遇。乾隆朝官修《贰臣传》、《逆臣传》彻底形塑了降清明将的形象，终有清一代而不改，且为后世所沿袭。

降清明将一经官方贬斥，其形象便定格为贰臣、失节者，而遭遇后世鞭挞。只是历史人物形象，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其本身成为一种历史符号，会被不同时代的人所建构。晚清以降，民族主义兴起，持有民族主义立场的革命者，从排满革命出发，给予降清明将以不同的评价。贰臣降将与忠义之士，共同构成了晚清以来革命主义者书写南明史的重要素材。晚清民族主义的兴起，不少在排满宣传中发掘出来的南明人物事迹，亦同时被纳入爱国史家的国族历史书写中，成为建构国史以凝聚认同的重要“象征资本”。<sup>[7] (P171)</sup>清末以来的排满革命，以清朝为斗争对象，作为清初开国功臣的降清明将们，自然难逃民族主义史家的批判。此种批判与清朝官方从道德伦理层面上的批评不同，更多是民族主义的、华夷之辨的，责难其背离汉族立场而投靠少数民族。

晚清以来，中国面临着严重的内忧外患，严重的外敌入侵，帝国主义的步步紧逼，让时人对民族英雄倍加推崇，对贰臣降将则大力鞭挞。尤其是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军国主义悍然发动侵华战争，以汪精卫为代表的一批中国人，主动投靠日本势力，充当汉奸。民国学人们在借助明末民族英雄来激扬民族精神的同时，也大力贬斥明清易代之际的贰臣、降将，来表达对汉奸们的痛恨和鄙视。降清明将在抗战时期作为汉奸的代名词，被重新加以贬斥，更多的赋予了特殊的时代意义。

#### 4 结语

降清明将的历史书写，经历了清初、清中期、晚清排满革命运动、抗日战争时期四大主要阶段。清初明遗民基于故国情结和遗民立场对降清明将多有指摘，而清朝官方当局则从现实政治的意义考虑对降将给予更多的表彰与回护；随着清朝统治的稳定，清朝面临着重建道德伦理，重塑忠义观念的问题，降将不再被看作是巩固统治的凭借，反而成为失节者的代名词，乾隆帝下令

修《贰臣传》、《逆臣传》，降清明将被彻底否定，再也没有恢复到清初的礼遇地位。晚清排满革命兴起，作为明末殉节之士对立面和清初开国的有功之臣，降清明将受到了革命主义者的再度批评，批评其违背夷夏之防，投靠少数民族政权；抗日战争时期，外患严重，汉奸投敌，民国学人们以降清明将来比附投降日本的汉奸，对降清明将以更为激烈的批判。降清明将，在历史书写中的地位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改变，其形象变迁反映了不同时代人们的忠义观和心态变迁。

目前对降清明将的研究，更多还是从传统道德伦理、民族大义出发，较少关注研究降清明将形象变迁及其背后的时代意蕴。从明清易代之际到21世纪的今天，关于降清明将的书写代有书出，如何将不同时期不同阶层人们的降清明将认识，进行一个总体的梳理，并且从中分析历史书写背后的动机与深意，进而考察时代与人物形象变迁的关系，将是新时代的我们所需要关注的新课题。

#### 参考文献

- [1] 陈永明. 清代前期的政治认同与历史书写[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 [2] 叶高树. 降清明将研究(1618-1683)[M]. 台北: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 1993.
- [3] 秦燕春. 清末民初的晚明想象[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 [4] 韦祖辉. 海外遗民竟不归: 明遗民东渡研究[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7.
- [5] 赵园. 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 [6] 杨海英. 洪承畴与明清易代研究[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6.
- [7] 陈永明. 从逆寇到民族英雄: 清代张煌言形象的变迁[M]. 台北: 国立台湾大学出版中心, 2017.

作者简介: 吴海峰(1992—), 男, 安徽铜陵人, 博士生, 西北大学历史学院, 研究方向: 宋史、中国古代军政史与史学史。